

天津工商史料丛刊

第五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工商史料丛刊

第五辑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内 容 简 介

本辑比较集中地发表了几篇老一辈著名工商业者个人生平事迹的传记，其中有民国初年担任过顺直省议会议长、参加过老西开事件的反法斗争和“五四”运动、天津恒源纱厂创办人之一的边洁清先生；有为我国水泥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陈范有先生；有国货售品所创始人、“爱国布”的倡导者、并在历次反帝爱国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宋则久先生；以及德高望重、至今健在，具有创业精神的丁旭斋先生和李耀庭先生、陈洁清先生等。

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他们的子女、亲友，或亲自执笔，或积极提供资料，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我们深表谢忱。天津这方面的工商人物还有很多，我们热切希望大家一齐动手，更广泛地收集这些珍贵史料。

另外，本辑发表了木商业、金店业和几家企业的史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读者、编者、作者这一栏目中，发表了两篇《天津饮食业》考，期望进一步沟通读者、编者、作者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定价1.50元

报刊登记证第310号

目 录

忆先父边洁清·····	边嘉珏	(1)
爱国的实业家陈范有·····	程蔚	(23)
爱国商人宋则久·····	敬瑞	(33)
我的回忆·····	丁旭斋	(73)
元隆绸布庄创始人		
——我的爷翁胡树屏·····	陈毓蕙	(93)
从事织染业一生的陈洁清·····	子珍	(98)
天津照像业的先驱李耀庭		
与中国照像馆·····	李博文	(105)
天津市木商业·····	程馨山 李捷三	(116)
解放前的天津金店业·····	史文	(132)
一个投机商的始末		
——记隆泰证券行·····	林凤钧 雍鼎臣	(143)
中美公司始末·····	高仕圻 力谢盐	(155)
源丰百货商店兴衰史·····	路敬之	(167)
日伪时期黄金市场见闻·····	李秉衡	(174)
漫谈山西“票号”·····	许敬敷 王子光	(179)
读者·编者·作者		
《天津饮食业》考之(一)·····	张澜生	(185)
之(二)·····	杨文泉	(190)
补白：我与宋子文的短期关系·····	林凤钧	(91)

忆先父边洁清

边嘉珏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恰如一条奔腾着的洪流，人生则是一叶扁舟在洪流中驶过，虽然千回百转，但终究会留下舟迹。

人总是受一定的历史局限，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漂泊流荡。老一代人走完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旅程，回顾往事，将使后来人有所思考，有所获益。

出身寒微 苦学成材

先父边守靖，字洁清（原字洁卿），天津市静海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先祖讳仲三系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举人。因家道中落，先祖去世又早，故先父少年时家境贫寒，自八岁即为村中富户放牛。唯自幼资质聪颖，笃志好学，虽因家贫无条件读书，但就在每天放牛时，将牛系于私塾（清代的民办学校）近旁，任牛吃草，自己则静坐在私塾窗外，听老师授课。时间既久，收获颇多。塾中老师每天课后出门，必见先父在窗外听课，问所授课业，应答很好，深为老师嘉许，乃令免交束修（学费），入塾学习。老师知先父生活困苦，时常在生活上给以资助。由于得到老师的悉心教诲，学业得以精进。在乡试获中后，

于光绪廿九年（1903）在河间府参加科举考试，中癸卯科优廪生（见静海县志）。尔后曾返乡任教。未久，又考中官费留学，赴日本东京，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当时由于家境贫寒，赴日旅费筹措维艰，赖先母田子敬变卖嫁妆及亲友襄助，始克成行。在日本求学期间，由于清政府官吏贪污腐败，留学生之公费屡被克扣；况仅依靠此菲薄之公费难以为生，遂在课余将教师讲示内容誊印为讲义，售予当时留学日本之富家子弟，借以弥补官费之不足。学成归国之时，全部财产仅仅是一袭长衫及简单行装。旅日期间，由于痛感清政府之腐败无能，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归国之后，在浙江省法政学校任教，宣传法治维新思想，并从事反清活动。未几，清廷鼎革，先父由浙江返回华北，在保定优等师范学校任监督，并开始政界活动。1912年通过竞选当选为顺直省省议会议员，时年28岁。当时由于先父初入政界，人地生疏，资历又浅，既无可倚恃之社会关系，又无充足之财力物力，因此，竞选能得以成功，其所费精力，当可想而知。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竞选所依靠的只是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明确的政见。为了取得胜利，他常日以继夜地工作。1913年3月10日又被选为顺直省省议会正议长。副议长为王秉嘉和王建中两位先生。当时顺直省省议会中，既有国民党员（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又有保袁世凯的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人。因此顺直省省议会在这个时期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

当时，袁世凯为了大权独揽、限制议会活动，曾颁布命令，要求各省议会执行他的御用组织咨议局的章程，受到各省议会的反对。顺直省议会当时致电国务院，表示坚决反对，并于三月十七日议决休会十日，要求修改章程。由于各省议会的压力，袁世凯被迫于四月四日公布了省议会临时法，表面上承认了议会权力。

1913年3月为了维护共和民主体制、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势力，广东省议会发起成立全国省议会联合会，先父与议会同僚积

极响应。四月二日发电邀请各省议会派员来津，出席省议会联合会会议。但在顺直省议会内，袁氏御用政党议员无理阻挠，既不同意由议长代表，又不同意选举参加联合会议人选，前后拖延近廿天，待至各省代表已陆续到津，顺直省议会代表尚未选出。直至27日几经折冲始派出王建中副议长和郭熙洽议员为代表，出席议会联合会。

1913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国民党人遂幻想组织责任内阁以遏制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因而遭到袁世凯的忌恨，于宋教仁乘车北上时，被袁世凯派人暗杀。4月1日顺直省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宋教仁被刺案，并致电中央要求惩办元凶。4月14日在河北李公祠举行追悼会，由先父主持，并报告了宋先生生平事迹。

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建立专制独裁政权，于1913年4月26日未经国会同意即向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以盐税和海关税为抵押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并同意五国派员监督我国财政。对此，顺直省议会于4月30日召开会议反对袁世凯违法擅借外债、丧失主权，要求国会对袁世凯依法弹劾。继又咨请内政部弹劾袁所委顺直省民政长冯某及顺天府张广建。对于议会的这些活动，袁世凯显然不能容忍，因而，对议员采取了经济上收买和政治上威胁两种手段，扼制议会活动。1913年9月孙中山先生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0月份解散国会，省议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因先父精于法理，聘为警厅第三科科长，后任行政科兼卫生科科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就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由于各省议会通电敦促，北京政府承认了临时约法，同意恢复国会。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只是同意了他们难以控制的南方几省政府恢复地方议会，北方各省议会并未恢复。1916年8月7日顺直省省议会议员一百四十一人，由先父领衔致电国务院，要求依据省议会暂行法第二十二条，由省长负责召开议会会议，与此同时致

函顺直省朱经田省长，要求召开会议。8月28日黎元洪总统命令，由顺直省省长负责召集，于当年10月1日恢复议会活动，议员任期继续。在此期间，顺直省省议会活动多载于当时的地方报纸，如《大公报》、《益世报》等，其中以《益世报》的记载更为详尽。这是先父从事政治生涯的主要部分，直至1926年议会解散。

旅日对先父思想上的影响

留日学习期间，日本社会对先父有两个最深刻的影响：其一，他亲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使日本废除了封建幕藩制度、建立了资本主义体制，给日本带来了经济振兴。这对促使他主张革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二，由于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穷兵黩武政策，侵华气焰十分嚣张，使他切身感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方兴未艾，从而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正因为如此，在他回国以后积极主张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支持群众的反帝斗争。并且一贯主张兴办教育，主张实行对外开放，倡议利用外资修建港口、铁路，以振兴实业。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政权基本上把持在贪婪成性的北洋军阀手中，他们只知抢地盘、搜括民财，根本不考虑国家兴亡。因而，他的这些主张根本无法实现。这也是导致他脱离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野心怀有深刻的戒心，因而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合作，而且始终不渝地站在反帝斗争的一边。

1916年法国帝国主义者公然侵犯我国领土主权，无理要求扩张天津法国租界的范围。谎称老西开地区（今天主教堂及国际商场一带）为荒滩洼地，妄图侵占。法国驻津领事为造成既成事实，竟然散发通告，要求我居住老西开一带人民向法国工部局交租。由于事

关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人民群众极为激愤，斗争也很激烈。当时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派其秘书刘符诚、参事夏治霆及驻津交涉特派员王麟阁实地调查。夏、刘、王三人认为只要该地租借给法国，地价必将暴涨。为发卖国财，他们一方面组成地产公司，一方面与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谎报老西开确系荒滩洼地。由于北洋政府颀预腐败，帝国主义分子更为猖狂，10月18日法国帝国主义驻华公使马德，居然以最后通牒方式照会北洋政府，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交让老西开地区；法国驻津领事还疯狂指使法国警察越界滋事、并亲率法国警察及安南（越南）兵过界，殴伤我国人民、抓走我国警察。天津各界人民群情激愤，誓死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各界爱国人士卞月庭、孙凤藻（商会）、赵君达（北洋大学校长。后因主张抗日，“七七”事变后被日本派人暗杀）、孙子文、王芝祥等组成国权国土维持会，领导斗争。事件发生后，先父即于10月21日召开顺直省议会特别会议，会上由先父将案情报告全体议员，继由各界代表详述斗争详情全体议员群情激愤，议决：

①派交涉员立即去法国领事馆交涉。

②推选议员六人偕同群众代表二人、即刻晋京，面陈中央请令定夺。

③抵制法货。

10月23日省议会继续开会，会议由王浚明副议长主持（先父率议员晋京未归），出席议员113人。会议议决六项办法（见后），并致电国务院，要求全力主持严正交涉。

10月25日下午，先父率议员184人偕同卞月庭、孙凤藻先生及各界人士共1458人，在大舞台戏院发起公民大会，仍推王浚明副议长主持，并通过省议会的六项决议如下：

1、全国各省断绝与法国之贸易。

2、不使用法资银行之货币。

3、解散惠民公司不准其招收华工。

4、不将我国出产之商品售给法国。

5、认真究办为法国作侦探的中国人。

6、致电我国驻法大使，要求法国政府撤换其驻华公使及驻津领事。

并发起组织天津公民大会。

10月29日又通电全国各省，呼吁共同斗争作政府外交后盾。

25日会议以后，先父又偕同国权国土维持会议代表卞荫昌、孙凤藻，直隶同乡会代表王芝祥、李榘、严智怡到国务院上访。29日上午在陆军部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接见。开始段对各界人民斗争不以为然，经各代表慷慨陈词，段始为之动容，答复以五日为期全力交涉。同日下午黎元洪总统又接见了先父及所偕五位代表，在居仁堂听毕各代表之报告，答复说，民意如此，政府当然负责。与此同时，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省政府、督军、群众团体函电交驰，热烈支持。冯玉祥将军在电报称：当率全师官兵环甲枕戈誓作后盾。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

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崇高民族气节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将背叛民族利益的夏治霆（外交部次长）、刘符诚（外交部秘书）、王麟阁（交涉员）等，撤职处理。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至1919年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协约国列强在法国巴黎召开分赃会议，日本代表竟在会上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华特权。消息传来，舆情大哗，山东人民和留日学生首先奋起斗争，北洋政府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勾结日本，进行卖国活动，也受到人民坚决的声讨。4月23日先父以顺直省省议会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彬乔治、法国总理克利门梭及意大利首相欧兰塞等，要求巴黎和会主持公理，消灭强权政

治，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路矿。

迨“五四”运动爆发后，先父站在广大群众的一边。5月6日为了声援留日学生及北京学界的“五四”爱国斗争，又以顺直省议会的名义致电总统府及国务院，赞誉学界“热血喷涌，奔走呼号，凡所以为国者，可称仁至义尽。民气之不可过遏，务请（总统及总理）俯顺舆情，速电巴黎和会陆专使等，就近与协约国各专使，援理严重交涉，誓不达还我青岛目的不止”。同日又致电徐世昌总统，申明“京师学生殴章宗祥事，实因全国人民义愤所致，非一二学生所可负责。”要求释放被捕之爱国学生。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首先是看到我国内部的分裂和软弱。当时北洋政府盘据北方。各省军阀割据，南方国民党政府软弱无力，南北双方正在上海重开和议。为了呼吁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五月十日，以省议会名义致电和谈双方代表，呼吁“务望诸公各捐权利之争，共作保邦之计，但能促进国家统一，便是外交后援，挽救危亡，诸公是赖。”同日，复电我国驻巴黎和会专使，电文云：“青岛问题恶耗传来，鲁、沪、京、津学商界，义愤填胸，已作坚毅举动。务恳在和会议席，仗义执言，坚持到底，不达直接归还目的，并废除二十一条密约，决勿签字，全国人民誓作后盾。”另一方面致电巴黎和会，声明：“顷闻青岛问题，将听中日自行解决，是摈我国于协约平等之外，公理公法均极不合，举国激愤誓不承认。恳诸公主持公道，令青岛直接还我，勿为世界将来留种祸因。”

为了惩办卖国贼，又致电中央，要求“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阳托亲日，勾通卖国。内奸不绝，外患难防。既经众议院提出查办案，恳准案令褫职法办，以惩祸首，而表示外交之决心”。

当时段琪瑞政府为压制“五四”运动，竟命令电报局停止发电。这就反映了当时的北洋政府的亲日卖国面貌，也反映了人民斗争的威力。

当时天津商界爱国人士，如叶兰舫、卞月庭、孙俊卿等，在“五四”运动的激励下，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天津总商会为响应全国的爱国斗争，于5月10日宣布罢市。

在这场斗争中，绅、商、学、报各界紧密团结在一起。五月十二日天津各界代表在省议会开会，到会各界代表二百二十余人，推举先父为临时主席，登台报告开会宗旨，并提出议案三项。即：（一）研定青岛问题力争解决办法。（二）电请中央罢免卖国贼。（三）以大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代表，嘱令勿在和约签字。并议决成立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以联络各省人民共同声援外交活动。

五月十四日顺直省各界公民联合会，在顺直省省议会开会，公举边洁清、孙仲英、卞月庭为会长，确定：

（一）挽留因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而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二）抗议日本政府捕押我留日学生，召回全体留日学生。

（三）反对保定各校校长压制学生活动，设法保障学生集会自由。

（四）召开全埠公民大会，力争达到收回青岛、惩办国贼之目的。

五月下旬又以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公告，要求各县公民为抵制日货、删芟国贼、保全国土而共同努力。

六月八日下午为解决当局出动军警监视学校问题，偕省议会副议长王浚明、商会会长叶兰舫、卞月庭去拜访省长曹锐，要求保护爱国学生。由于群众的斗争，以及绅商各界的支援，省长曹锐被迫作了让步。

六月十一日绅、商、学界再次集会，公推先父为临时主席，讨论最后办法。会上学生代表马骏为抗议商界一无赖市侩之滥言，表示青年爱国之决心，曾以头触石。以表示誓死不渝之决

心，志行坚毅感人肺腑，先父与到会代表签字议决举行第二次罢市。

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是持压制态度的。直隶省长曹锐、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都与先父有很深的交谊。因而，做为顺直省议会的议长，他是受到公私双重的压力。但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站在人民的一边，坚定地支持并参加了人民反帝斗争行列。

“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的大觉醒，它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了封建保守的北洋政府，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走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现在，1916年的老西开人民反法斗争，1919年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都已过去将近七十年的时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帝国主义任意侵占我国领土，践踏我国主权、压迫我国人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远非昔日可比，但是当我们回顾老一代人，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时期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那种舍身奋斗的精神，依然深深地激励着我们。特别是耀华中学（现天津十六中）赵君达校长，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坚持抗日的精神，天津商会卞月庭、叶兰舫先生及顺直省议会王浚明先生等的抗日民族气节，都给我们留下深深的记忆。

对先父和人民团结斗争的这些事迹，党和人民是给予了相当的评价的。1950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在北京开会，先父以天津分会主席及全国救总委员身份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对先父当年支持学生爱国斗争的事迹，给予了热情的评价和表彰。在当时的报纸及以后的文献中都有记载（以上电文资料主要依据益世报及大公报资料）。

先父反对外国侵略，坚持民族气节，还表现在他一生中的各个历史阶段，如他于1926年辞去顺直省省议会议长职务后，由于

看到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之腐败，从来不肯再出任政府职务。但其中有一次例外，这就是1936年8月张自忠将军来天津，就任天津市市长。张将军生前与先父相交至契，相知也至深。在张将军莅津就任时，曾至寒舍要求先父襄助工作。当时先父由于深知张将军高尚的民族气节，故破例出任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其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英、法各国使节又唯日方鼻息是从，而蒋介石政府又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共产党，对日则一味屈膝求和。在这种情况下张将军日夜焦虑，先父在咨询襄助方面也常致席不暇暖的地步。有时刚刚在市府赴宴回来，还未来及喝一杯茶，就又被市府请走。这种紧张局面一直持续到张将军1937年7月离开天津时止。（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在天津市政协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张自忠访日经过记闻》中有记载）。“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在日本侵华首脑中，不少是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也有不少是先父留日期间的同学，他们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甘言邀请先父出任伪天津市长，被先父所谢绝。尤其是抗战后期，日本人欲抛掉王克敏、王揖唐，另换汉奸以支撑伪华北政委会。为此，派人邀先父主持华北政局。但无论敌人采用何种手法，先父始终屹然不为所动，保持了我中华民族高贵的民族气节。

当时，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政治上对先父施加压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多方逼迫要挟。日本财阀早在“七七”事变前就阴谋独占我华北纺织品市场，它利用在国际市场上掠夺的原棉，以逃关走私等手段全力向我国倾销，造成我国市场上棉贵纱贱的怪现象，使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工业亏累不堪。日本财阀则乘机掠夺吞并。至1936年天津市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工业中，大中型纺织厂除恒源纱厂和北洋纱厂外，其余纱厂包括裕元和华新等纱厂在内几乎已全被日本资本所吞并，因此恒源纺织厂就变成了日本人势在必得的目标。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八年中，日本人

的吞并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日本入侵天津以后，日本满洲纺织株式会社就提出要和恒源合营，被先父拒绝。日本人见第一个步骤没有得逞，就采取了第二个手段，即从恒源纺织厂股东手中高价收买股票，企图利用控制股份的方法来控制恒源纱厂。由于恒源纱厂的股票是记名股票，股东出让股票，必须到董事会办理过户手续。因此，这个阴谋，又立即被先父所发觉。后来，在恒源纱厂董事会做出一项决议：股东出让股票，应由本厂股东优先收购，从而挫败了日人的阴谋。日本人见其阴谋一再破产，最后终于恼羞成怒，暴露出狰狞面目，以献铁为名，强迫拆走恒源纱厂11,880个纱锭、30台进口电机以及其它机件，约占恒源纱厂设备总量的1/3左右。在八年抗日战争过程中，恒源纺织厂的董事们团结一致，运用各种方式和条件（包括利用诚孚公司驻厂人员与日本军方的关系），抵制了日本的吞并阴谋。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所承受的压力和艰辛，是不难想像的。他也因此而受到全体职工和股东的支持。在抗日胜利后的股东大会上，全体股东对先父护厂的功劳，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一致建议给予特别的酬谢。

勤俭朴素 谦恭处世

先父出身寒素，一生创业维艰，深知民间疾苦。又值他一生中，恰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岁月，所以他一生中生活比较朴素，不事奢华。在事业上克勤克俭，待人接物方面，敬老惜贫，谦恭处世。

在先父一生中，对于培育他的老恩师，是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在他生活甫定之时，即开始为老师安置生活，并时常接到天津奉养，直至抗日战争期间，老先生已经年逾古稀，还接到天津盘桓供养，对生活起居照顾十分周到。并对子女们盛赞老师之美德，他的这种感恩图报的处世精神，对我们也有深刻的影响。为

昭彰老先生育才之美德，我曾去故里查访老先生之身世，惜因年代久远，陈迹湮没，无从查考，实感遗憾。

在先父由南方归来之初，曾开业为律师，当时经济上相当窘迫。有一位人力车夫马庆昌先生，非常同情先父的困难而且敬重他的才干，每天义务接送他去工作，并在生活上，社交上，事事代为周旋。故在先父任顺直省议会议长后，即聘马先生为我家总管。至先父弃政从商以后，由于缺乏经验，经营中每致亏累，因感前途未定，乃为马先生在故里购置产业，厚赠之，令返故里。当时，对先父这些作法，子侄辈颇有烦言，认为待外人过于宽厚。先父则说：“没有老恩师和马庆昌，我边守靖哪有今天！”根本不理睬这些非议。

先父青年时代离开故里，但经常回乡扫墓。他一生中从不坐车进村，车行至离村三里，即下车步行。入村后必先趋奶娘张老太太家问候，再省问老师，然后访问同乡父老故旧。遇长者必趋前问候。对长者必请以乳名相称。曾于祭祖后，对边氏族人说：

“我在外面做什么事由，这算不得什么光荣。但回乡来，乡亲父老仍像我当年在村里一样对待我，这才是我的光荣。”故乡父老至今犹赞誉先父谦逊有礼。就我的记忆来讲，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而且不居功、不自矜。无论是对亲友、对下属，还是对家里的服务人员总是平心静气平等待人，从不疾言厉色。因而故乡静海来津住闲的亲友从不间断。当时家中吃饭人口经常30—40人，其中我家人口大体14个人。亲友中既有常住的，也有短期盘桓的，虽然这在经济上给我们增加不少负担，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但从未见他有不满之色。

先父毕生热心公益，在其一生中曾为故乡及教育事业稍尽微薄之力，现略记如下：

（一）修桥 故乡大瓦头镇与王口镇中间，原建有一桥，为人民商旅往来要冲。该桥由于年久失修，于民初毁于军阀内战，

当地交通往来顿感不便。乡人父老每议重修，先外祖母田老夫人临终前，亦曾遗嘱薄葬，集资重修此桥。但由于工程较大费用浩繁，而未能进行。至民国八年（1919）在乡里父老努力下，复得先父积极赞助，始开工修建。于民国十年（1921）竣工，桥名“崇善桥”。此次重返故里，故乡父老犹能称道其事。此桥解放后利用原基础改建。在故乡静海县志中，载有邑人刘先奎所撰《崇善桥碑记》曾详记其事。

（二）热心教育事业 先父出身寒素，苦学成才，在旅日留学期间，又目睹日本发展教育振兴民族之情况。切身体会到教育之重要。因而他一生中对发展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他不但亲自从事过教育工作，而且积极支持赞助教育事业。1919年5月天津市成立警学研究会曾被选为会长。在他经济条件比较宽裕以后，一直资助天津各校。如耀华中学、广东中学、浙江中学、慈惠中学、以及津沽大学等。并曾担任过董事或董事长。至今耀华中学（天津十六中）礼堂中仍有勒石为记。

（三）热心慈善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敌占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饿殍盈野，当时先父已过中年，在京津工商界中较有声望。每年都有一部分工商界人士为他庆寿。他因历来不愿多事铺张，经婉言倡议将各商号及友人馈赠之寿仪，委托黄卅字会邹先生举办粥厂，以济贫民过冬。由于他自中年以来，多年办赈，在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于1950年在北京成立，他作为全国救济总会的委员出席了会议，并担任天津分会的主席。同年六月天津市成立失业工人救济总会，市委副书记兼天津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同志任主任委员，陈荣同志及先父任副主任委员。为了开展救济工作，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动工商业者积极捐献；同时组织失业工人以工代赈，从而取得成效。其情况1950年6月6日津市各报均有报导。

（四）热心公益事业 解放以后，天津市总工会河在北戴河